

让国家监护制度为所有孩子托底

记者20日从相关部门获悉,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世峰称:“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行政干预的核心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据新华社)

近年发生的一些恶性伤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屡屡引发社会上关于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权的讨论,譬如:去年南京两女童饿死家中;近日西安一名7岁女童离奇死于家中,警方初步判断是饥饿致死,其母亲疑似患精神疾病。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是国际通行做法,其目的不仅是“对类似行为起到震慑作用”,而是让国家承担起对未成年人的最

终监护责任。人们对于这项政策的最大担心也在于,失去原来的监护人后孩子谁来管。建立国家监护机制势在必行。

首先,我国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履约国,承担起对儿童的国家监护,是一项国际责任。而目前,我国民政部门只是对生活困难的儿童进行外国的救助、帮扶,而没有以国家的名义行使监护的职责。而在英国,英国女王是儿童的最高监护人,在香港,是社会福利署承担最终监护责任。

我国目前的法律也有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相关条款,但并无可操作的具体规定。而这正是建设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的重点所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监护干预制度由这几环构成:发现报告——调查核实——诉讼——善后安置。

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常发生在家庭内,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基于此,澳大利亚等国制定了强制报告制度,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和涉及儿童保护的社工人员如幼儿园老师、医生,如果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尤其是家庭成员的侵害行为,有义务向相关部门报告。

发现报告是干预的起点,之后还有专门的部门受理,并进行调查核实。每个国家负责调查和后面提起诉讼、安置等系列工作的部门并不一样,在我国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建议由民政部门担负这些职责。

诉讼是核心环节。社会保障部门在对失责父母提起诉讼时,不仅要提供调查结果、要求剥夺其监护权证据,同时也要提供对当事人儿童的善后安置方案。同时,由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组成的第三

方,也应对接收机构或寄养家庭进行评估。这样,法院才能够做出真正对未成年人有利的选择。

未成年人的善后安置应由政府负责统筹。福利院、社区都是可选项,更合适的是寄养家庭。不过,我国目前的社区保护机制仍不健全,寄养家庭制度也未普及。现有状况下,较可行的做法是,增加幼儿园的相关职能。对失去监护人又暂时没找到新监护人的孩子,交由定点的幼儿园照料,政府给予政策与资金扶助。

国家监护机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立起来非一朝一夕。首先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制度出台后,更需要地方政府积极承担起责任。让所有孩子的成长,都有国家的力量托底。为每个生命兜底的责任意识,才是制度建设的真正动力。

孔维钧

“三公”最大的压缩空间在公车

截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区的两会已经召开。从各地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大多数省份的报告都提及了三公经费情况,并表态要过紧日子,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多个省份明确提出了2014年三公经费支出的具体压缩比例。压缩比例最高的为浙江省,达到了30%;江苏、宁夏、青海等省均提出要压缩5%。(1月21日人民网)

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新风下,各地提出压缩三公经费支出的具体比例指标,尤其有的省份压缩比例超过10%甚至达到了30%,确实是一组令人欣慰的数字。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各种规章制度并不健全的阶段,指标控制是最简便易行的手段。但是,在政府部门行为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过程中,单靠“指标控”来压缩三公经费支出,空间仍是有限的。

2013年各地三公经费支出普遍出现较大幅度缩减,譬如福建削减了13.5%;甘肃下降了20%以上;海南文昌市降幅为13.7%;武汉市同比下降16.5%……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就此指出:这与2012年年底中央提出的“八项规定”有关。“八项规定”从遏制公款消费、控制出国等源头约束了三公消费,使得各地政府部门三公支出缩减。

如果条件继续地审视各地三公经费支出的下降,公务接待费用瘦身和因公出国(境)费用压缩,贡献了相当大的比例。譬如海南文昌市三公经费支出总体下降了13.7%,其中公务接待费用和因公出国(境)分别下降33.5%和54.1%;宁夏去年三公经费预算普遍削减5%,实际上仅公务接待费用就下降35%。也就是说,在三公经费缩减中,占三公经费60%以上、金额最高最难的公车经费压缩,并没有

做出绝对贡献。

事实上,在“八项规定”之后,中央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和因公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品、资源节约等均做了明确规范和限制。关于公务用车,要求“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正如叶青的观察:在现在的基础上,三公经费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压缩空间,其中之一就是公车改革问题。

以此来看,各地提出的今年三公经费支出压缩指标,是多还是少呢?这显然很难判断。事实上,各地公车改革尚未大面积铺开,如果这项改革在今年拉开大幕,那么各地三公经费支出缩减远超过5%,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仅仅从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节庆论坛会展等方面压缩三公经费5%,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却在推动公车改革方面有失诚意和动力。

三公经费缩减多少才合理?这个问题在三公行为规划和改革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准确的答案。只有政府部门的完全纳入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制度约束后,明确缩减比例才具有不凡的意义。也就是说,缩减三公经费需要以改革进度和指标双控。 燕农

大数据让你成为“透明人”

当你一家大型购物中心挑选商品时,商家的传感器已经记录下你走进每一家店铺的时间,后台的管理人员正在通过这些信息分析前不久摆放在店铺门口的宣传品是否起到作用;当你打字时,你的输入习惯以及每一次纠错将被记录,用以完善其自动补全和拼写检查系统……不经意间,大数据已经渗透到了你的生活。

刚刚过去的一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大数据的核心技术日益突破发展,商业价值逐渐凸显,并开始从IT行业向传统行业渗透。拥有海量数据池的互联网公司最先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行为,大大降低了广告投放和采购成本。其他行业很快看到了大数据的巨大商业潜力,迅速搭上大数据的高速列车:服装公司可以从你的搜索痕迹中计算出流行色,金融和保险公司通过分析交易数据可以定制个性化金融解决方案……大数据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透明,但要从“萌芽”长成“参天大树”,面临的难题和问题还真不少。

就大数据本身的发展来看,目前的最大难题是人才短缺,这是大数据实现价值的重要制约。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到2018年,美国大数据领域中深度分析人才职位的缺口为14万到19万个,另外还需要增加150万名能提出正确问题、并有效利用大数据分析的管理者和分析师。从根本上说,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并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因此,上述缺口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据媒体报道,为了迎合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潮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将于今年3月推出首个在线大数据专业课程,以深入探索大数据难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不过,“网络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好,它如同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莽撞、任性……不计后果”。随着信息存储成本的持续降低,分析工具的日益先进,加上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数据的经济价值并投身其中,大数据引发的隐私安全问题也随之而来:大量的用户数据,包括人们的行为、情绪,甚至地理位置和身份信息被搜集,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却并不知情。大数据让物质世界变得可计算,把人们的生活痕迹印刻在互联网上,也让用户失去了安全感,变成了“透明人”。

此外,从更大的层面上看,大数据还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全。例如“棱镜门”事件,其背后暴露出来的,则是更高层次的数据安全问题。有军事专家评论,斯诺登泄密事件相当于美国损失了10个重装甲师。由此可见大数据的价值和“杀伤力”。总之,有关大数据的很多故事听起来都很美,实则却风险暗伏。如何建立机制保护数据的安全,是需要各国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周宇尘



回家吗?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但回家过年就意味着各种开销,而对着迟迟没有“鼓”起来的钱包,你还敢回家吗?近日,《羊城晚报》联合全羊网展开问卷调查,611名网友参与了调查。70%的网友表示今年过年将会回家,但57%的网友则表示,春节如果回家,最害怕花钱太少不够用。那回家到底要花多少钱?近八成的网友表示,自己过年的花费已经超过了自己一个月的收入。 焦海洋/图

剩男剩女能否“快乐回家”

“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数以亿计的游子,正规划着归乡的旅程,或已经走在回家路上。这个冬天,水陆空交通工具,不管从哪里出发,都指向一个目标:家。

中国春节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团圆。千门万户里都有一位母亲,无数次想象着家门被游子敲响的那个甜蜜瞬间。然而,很多被叫做“剩女”或“剩男”的大龄未婚青年,宁可舍弃堆积了整整一年甚至数年的蚀骨乡愁,因为担心被父母亲友逼婚而不愿回家。她,宁肯“芳树无人花自落”,而他宁愿“秦山一路鸟空啼”,以逃避婚嫁压力,换取暂时孤独的自由。

倚门盼归的慈母意象,足以温暖古今中外,何以成了他们试图逃脱的压力?

父母们有错吗?在他们看来,子女进入婚姻是一生幸福的起点,平时帮不上忙,趁着春节打探情况包括动用社会关系为适龄青年牵线搭桥,无可厚非。孩子们也委屈,婚恋与否非常隐私,凭什么要在父母的社交圈里公然炫耀,还被分析盘算?

所谓大龄青年问题古已有之,何以于今为烈?要像被拐儿童一般仰仗“微博解救”,要被婚恋市场相亲大会消化瓦解,要让婚恋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还要成为父母亲友喋喋不休的焦点话题,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如今30岁上下的青年,赶上史无前例的三碰头时代:第一批进入婚嫁年龄的独生子女,父母的热切期望高度集中,比任何年代都厚重;人口“流动性过剩”则进入第二期,流动劳动力年龄结构大幅下降,不像第一代那样往往是在家乡娶妻后才远赴他乡求职;城乡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与代际关系正在重构之中,家庭概念在地理上的崩解与在心理上的纠结相依形成鲜明对照,远离乡土的熟人社会,年轻人的离心力与中老年人依恋独生子女的向心力同样强烈。这样的“三碰头”,使得所谓“剩男”“剩女”与家庭的矛盾被陡然放大,并在春节这个几乎是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里,集中呈现。

说到底,这是一种新的代沟。地理的、教育的与年龄的距离,一同拉远了父母子女的心理距离。年轻一代或者认为,孤独是一种权利;年长者则认定,身为独生子女,你的幸福与否维系着家族荣辱,而不管男女老少,在一个生存竞争日益严峻的物质社会,择配也被商业化浪潮裹挟得踉踉跄跄,诸如职位、出身、住房、收入、发展机会甚至身高、外貌的权术,都似乎成了天经地义,而爱情则解被提及,甚至扬弃进了被遗忘的角落……

当婚恋问题超越私域,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时,需要重视的可能就是相伴而生的阶层固化问题。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择偶的利益实现?是否因为依靠个人奋斗实现自己梦想的空间并不宽广,成功难以预期?

这让我们对新一轮的改革寄予厚望。唯有深化改革,才能让全体国民共同享有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也才能让年轻人更好地拥有爱的梦想,争取创业的机会,享受奋斗的甜果,让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到了那一天,游子的回家,才会更加欣然,更加坦然。 李泓冰



为何要“骂”春晚?

日前,马年春晚的总导演冯小刚说:“无论春晚弄成什么样都是挨骂的。看春晚是一个习惯,骂春晚现在渐渐成了一种时尚了。”(1月20日新京报)冯小刚这话不能说是没道理,如果把“骂”改成“批评”会更合适一些。这确实反映了人们对春晚一边骂一边看的矛盾心理,春晚不办不行,办不好更不行。世界上事就是这样,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观众为何要“骂”春晚?依我管见,不外乎这样几个理由。

一是众口难调。一家几口吃饭都很难人人满意,你说成我说淡,央视春晚要调13亿中国人的口,还包括海外几千万华人的口,要让每个人都满意是绝对不现实的。具体来说,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农民工与“白骨精”,知识分子与领导干部,北方人与南方人,城里人与乡下人,喜欢的节目类型就各有不同,欣赏的艺术形式也大相径庭,春晚只能是尽可能合乎大多数人的审美意趣,有大多数人认可就行了。而觉得不合自己胃口的观众,骂几声,批评几句,那是太正常不过了。

二是爱之深,责之切。因为春晚是国人一年一次的年终盛宴,大伙对春晚的标准要求特高,期望值特大,是以文艺演出国家队的标准来要求的,所以,节目稍有瑕疵,就会引起一片非议,乃至苛求。其实,平心而论,春晚的每一个节目都是精雕细刻而成,如果拿到平时的任何一个晚会来演,都是精品。

三是春晚确有不足之处。每次春晚,虽然从总导演到每个创作人员演出人员,无不废寝忘食,千方百计想出彩,但如果精益求精的标准来审视,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譬如老面孔太多,新人偏少,接地气不够,反映基层人民生活的节目不足,创新不够等。

总之,春晚有争议不怕,最怕无声无息,倘若人们连“骂”的兴趣都没了,这春晚就彻底寿终正寝了。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每年要办几十个春晚,可哪一台春晚也没有央视的春晚更引人注目,更为人关切,同时也是“挨骂”最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春晚“挨骂”也是春晚的骄傲。衷心期望,春晚的主创人员能从观众的“骂声”里汲取营养,看到不足,努力改进,大胆创新,不断推出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优秀节目,为全国人民精心烹制一顿色香味俱佳的年夜饭,为提高百姓幸福指数锦上添花。 陈鲁民

“摘星”不是酒店反转求存的根本之道

去年,内地有50多家星级酒店主动“降星”,甚至有的主动“脱星”。正在召开的浙江省“两会”上,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浙江省人大代表陈妙林一番话激起千层浪。(1月19日新华网)

一个酒店要想维持长久生存,广阔的市场必定隐藏于广大普通消费者中间,政府订单的利润空间虽大,但始终不能作为生存之道。中央反腐举措无疑为餐饮服务行业带来一次结构调整、创新发展的契机,围绕着“为谁服务”重新洗牌,重新梳理发展路径,明确发展方向。曾经偏离轨道的企业可以借此机会慢慢走向正轨,摒弃大众消费者心中“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固有形象,继续发挥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服务优势,以全新的面貌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完美胜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历史警示,想必让这一年来所有深受政策“重创”的行业记忆深刻,不单单是餐饮业。然而,其中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哲理也同时在告诉我们,只有经历过寒冬、沐浴过风雨的行业才能更加壮大,终将迎来另一个明媚的春天。 宋华

“去年,内地有50多家星级酒店主动‘降星’,甚至有的主动‘脱星’。正在召开的浙江省‘两会’上,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浙江省人大代表陈妙林一番话激起千层浪。”(1月19日新华网)

星级酒店等级划分本是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保护旅游者的利益,按照酒店的建筑设备、酒店规模、服务质量、管理水平,便于旅游酒店之间有所比较。但不知从何时起,代表着旅游酒店最高等级的五星级酒店成了很多地方政府接待的“香饽饽”,公款消费的“重地”。

一年来,中央的系列措施和规定让一些设备豪华、设施完善、综合服务齐全的星级酒店和会所行业发生了悄然变化。“会务餐”退订潮,酒店近一半空置,会所大量关停停闭等让餐饮业开始“淡定”。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星级酒店经营情况报告”显示,去年上半年,全国三星级及以上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为53%,较2012年同期下降6个百分点,一半空置;平均餐饮收入同比减少17.2%,平均会议收入同比减少17.8%。平均总营业收入方面,五星级酒店同比降幅最大,达到14%。

生存环境骤变,迫使很多星级酒店尤其是五星级酒店不得不考虑转型。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也能反映出,星级酒店曾经无厘头的辉煌与荣耀,在失去了政府订单这棵巨大的“摇钱树”后,也不怎么好“乘凉”了。为了生存和自保,主动“降星”甚至“脱星”就是表证之一,有的干脆停业,年后转型做其他服务,还有准备申报五星的酒店都暂缓申报了,在建的亦有停工或降低建设速度之迹象。种种现象表明,中央连番重拳之下的政策关联效应已经显现。

降星也好,脱星也罢,是形势所迫下的求生之举,但不是根本之道。如果还有酒店痴心妄想于“摘星”之后继续靠隐蔽的政府订单赚钱,恐怕前景会更惨淡。唯有转型,转什么,怎么转?市场自然会给出检验和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星级酒店“高处不胜寒”决定了必须要改弦“地气”,将服务对象更多地锁定在大众消费群体和一些民营企业,回归理性。